

第一章

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

法蘭克福學派

在英語國家，哈伯馬斯為人熟稔的作品有《交往行為理論》、關於商談倫理學各類文章以及《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籠統地講，他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理論都已經在這些作品中得到了各自闡發。哈伯馬斯還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理論家的領軍人物，他的著作也應被看成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理論家的批判理論進行不斷反思的結晶。

二戰之前和之後的一段時間，一群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文化批評家，在法蘭克福由私人資助的社會研究院進行研究工作，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由來。這些思想者在學院一本名為《社會研究雜誌》的期刊上發表文章，寬泛地說，他們遵從共同的學術範式：他們作同樣的理論假設，提出類似的問題，都受到黑格爾(G.W.F Hegel, 1770–1831)和馬克思(1818–1883)辯證哲學的影響。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所追隨的當代德國辯證哲學的傳統，有時又被稱為黑格爾—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它遠不是社會思潮的主

流。作為知識份子中的少數派，他們同當時佔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義歐洲傳統和邏輯經驗主義盎格魯—奧地利傳統針鋒相對。後來人談到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和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時，這個認識是不可少的。



圖6 霍克海默，社會研究院院長，攝於法蘭克福

霍克海默(1895–1973)，法蘭克福研究院名譽院長，對於1930年代「批判理論」範式的發展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霍克海默看來，批判理論將成為新的跨學科理論活動，它補充並改造了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哲學，在其中注入了來自精神分析這一相對新生的學科，以及來自德國社會學、人類學與非主流哲學家如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敏銳洞見。所以，批判理論的研究方法具有四個主要特點：跨學科性、反思性、辯證性和批判性。

法蘭克福學派率先將多視角、多學科的方法同時運用於道德、宗教、科學、理性和合理性研究。他們認為，不同學科視角的交叉能夠產生新的洞見，這樣的見識在一個視閥狹隘、日趨專業化的學術領域內則無法獲得。這樣，他們便挑戰了當時盛行的想當然的看法，即唯有自然科學的經驗主義方法具有有效性。

與幾乎包括了從數學、形式邏輯到自然科學的所有方面、霍克海默所謂的「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具有反思特徵，即內在的自我意識特徵。批判理論反思其自身產生的社會背景，反思自身在社會中的作用，反思其實踐者的意圖和利益，等等。批判理論同這樣的反思密不可分。

與跨學科性相結合，批判理論的反思特徵有望揭開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困擾着傳統理論(比如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幻象；也就是說，批判理論就是對於獨立的事實王國的正確反映。

知識的二元圖景加深了一種觀點，即事實是固定的、給定的、無法更改的、獨立於理論的。批判理論家摒棄了這種圖景，支持更為黑格爾式、辯證的知識觀。這種知識觀認為，事實和我們的理論都是變動不

居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在這一進程中，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論地或實踐地)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之間是相互決定的。

最後，霍克海默認為批判理論應當具有批判性。這一要求包含了幾個明確的主張。總的來說，這一要求意味着理論的目標應該具有實踐性，而不能是純理論的；也就是說理論的目標不應該僅僅是正確的的理解，還應該是創造出比現有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更有利於人類發展繁榮的局面。再具體一些，即理論應該有兩種不同的規範性目標：診斷和治療。理論的目的不僅限於為當代社會診斷病情，還應該通過指明社會進步的方面和發展的趨勢，來為改造社會助一臂之力。

當納粹主義盛行的政治氛圍使得學派成員(他們幾乎都是猶太血統)無法在法蘭克福繼續工作時，研究院不得不暫時遷址。先是移到了日內瓦，然後是美國。在美國，法蘭克福學派直接遭遇了對他們來說聞所未聞的社會現象，一個深陷於福特式工業資本主義和大規模生產的消費社會。在美國，好萊塢的大製片公司、廣播公司、出版公司已經實現了文化的工業化生產，這尤其讓他們深感震驚。這些壟斷巨頭採用巧妙的操縱手段，使大眾接受甚至支持一種隱藏在生活背後、干預乃至壓制人們的基本興趣的社會系統。例如，好萊塢制作的低成本商業電影，往往以俗套的大團圓結局為大眾提供廉價的滿足感。觀看這樣的電

影，大眾對阻礙他們追求真正幸福的社會制度不再批判，而是融入銀幕偶像的虛構幸福。這樣，文化便無意中充當了真實世界的廣告。霍克海默和比他年輕的同事阿多諾(1903–1969)，稱這類現象為「文化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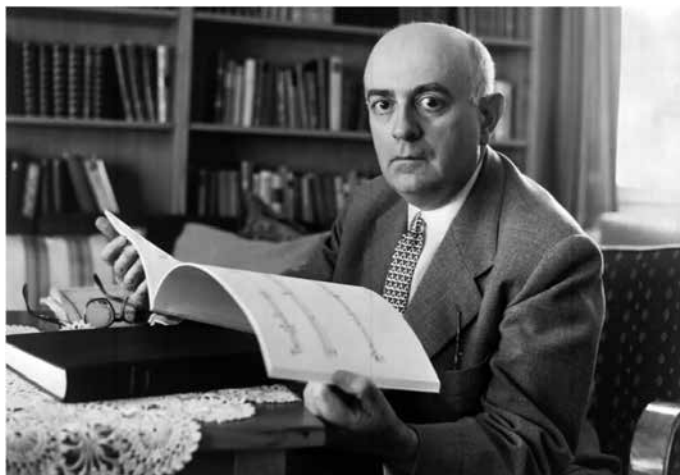


圖7 阿多諾，音樂學家、社會理論家、哲學家。哈伯馬斯在社會研究院的同事及導師。

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整體傾向的一個關鍵部分，這種傾向將創造、改變人們的需要與慾望，直至使他們真正欲求批量製造的垃圾，不再追求有價值的生活。分析這樣的現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廣告和其他形式的媒介如何操控主體的意識，製造出法蘭克福學派所稱的「虛假的和諧狀態」。虛假的和諧之

所以產生，乃在於人們認為社會具有理性、可以促進人類自由和幸福，並且社會無法改變，而實際上，社會是徹底非理性的，是人類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障礙，也是可以改變的。一百年前，在與當今社會狀況迥異的普魯士，黑格爾曾聲稱社會已經達到了真正的和諧，即在當時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下理性的主體能夠接受並贊同的狀態，因為在權衡一切因素之後，理性主體哈伯馬斯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最深層次的利益能夠得到實現。而法蘭克福學派，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基於他們在20世紀的經歷，把黑格爾的樂觀主義徹底顛覆。

1949年霍克海默回到了法蘭克福，對於實現批判理論的實踐目標——促成社會的巨大轉變，他和阿多諾都更為悲觀了。在兩人合寫的名著《啟蒙辯證法》（1947年出版，1944年曾以《哲學斷片》為名出版過油印本）一書的分析中，這種悲觀主義已經得到了理論化。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啟蒙的分析，為批判理論的後續發展確立了日程表。他們的理論始於黑格爾的假設（馬克思也同意）：人類以精神和物質活動（或者如馬克思所言，通過腦力或體力勞動）塑造或決定了他們身邊的世界。然後他們加上了一條歷史命題：到18世紀，工具理性，即對於完成既定目標或滿足既定慾望的最有效方法的思考，已經成為主要的知識形式。啟蒙的歷史進程，賦予了自然科學和技術上可用的認知

形式比其他知識形式更高的地位。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聲稱，自然科學對外部世界作出了可驗證的歸納和預言，它是手段/目的推理的一種隱蔽形式。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講，科學不過是深化人類掌握和控制環境的根本需要的一種工具。技術和工業就是這種工具的延伸和應用。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宣稱，工業化和官僚化的現代世界形成於一種合理化進程中。20世紀的社會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而人類的理性能力已經退化，變成僅僅是對如何以最有效方式達成既定目標的一種計算。世界的日益數學化和客觀化，造成了神話世界觀和宗教世界觀的終結。同時，人類賴以認識世界的概念又來自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環境。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制度化的生活愈加受到科學和技術，即工具理性的形塑。社會性的各種現代形式(工具理性的制度化形式)，依次引發了工具性概念、表現形式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它們造成了一種科學的、計算的、實用的思想傾向。繼之而來的便是工具理性地位的惡性螺旋式上升，它逐漸取得了獨一無二的排他性地位。

科學和理性服務於人類操縱、控制外部世界的基礎性需要——這樣一個假設有其陰暗的一面，即承認支配和統治這兩者與理性具有非常相近的同源關係。不僅是科學和技術，理性本身與支配就有牽連。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看來，即使是原始的理性形式，例如

魔法，也是人支配自然和他人的雛形。魔法師施法的目的就是要掌控自然界，由於手握魔法力量，他們便成為了社會中的統治階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根據盧梭(Rousseau)、伏爾泰(Voltaire)、狄德羅(Diderot)、康德(Immanuel Kant)等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觀點，啟蒙運動就是要將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並將人類引入自由與繁榮狀態，現在看來，這一運動事與願違。隨着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強盛，人類逐漸受到更為廣泛的行政力量的約束和管制，逐漸受制於日益強大、難以駕馭的經濟體系。啟蒙不僅沒有把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相反，它禁錮了作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想要經濟繁榮、物質豐富，得到的卻是貧窮和苦難；想要道德進步，得到的卻是向野蠻、暴力與褊狹的退化。這就是「啟蒙辯證法」，它使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社會，並影響了他們對於那個社會的弊端的分析。

在年輕的哈伯馬斯眼中，這種無法求證的悲觀主義削弱了社會理論的批判指向。如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啟蒙的解讀是正確的，如果旨在帶給人類自由和富足的啟蒙自肇始就注定要把人類推入不自由和悲慘的境地，那麼批判的社會理論就陷入了困境。社會理論自身就是一種啟蒙形式，因此按照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社會理論的廣義理解，它就是一種可以幫助人們

更好地認識社會、改良社會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正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一書序言中所承認的，啟蒙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實現的。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若沒有啟蒙，人類就會繼續滑向自我毀滅與不自由；之所以不可能實現，是因為啟蒙的實現有賴於人類的理性活動，而理性又恰恰是問題之所在。這樣一個疑難(*aporia*)，使得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論及批判理論的現實政治目標時更加慎重。(*aporia* 是一個希臘詞，字面上的意思是「無路可通」，喻指「困惑混亂」。)阿多諾最初對於理論可以指引社會、政治或道德解放所懷有的信仰，很快就潰散了，他甚至認為幾乎所有的集體政治行動都草率、專斷、徒勞。哈伯馬斯和他的師長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認為疑難實際存在，而哈伯馬斯認為疑難只是後者理論分析中的一個缺陷所致。

哈伯馬斯的最初回應

哈伯馬斯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論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範疇》(1962)，是對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批判理論概念作出的建設性批判。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西德這也算得上是部名著，但是直到1993年才被譯成英語。該書試圖解決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問題，同時堅持這種理論的最初宗旨、保留其對社會弊端所作分析的某些方面。

《結構轉型》一書對於批判理論最初範式的堅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這本書是跨學科的結晶，它融合了來自歷史學、社會學、文學和哲學等學科的深刻見解。其次，它試圖指出現代社會進步的和理性的方面，使其區別於反動的和非理性的因素。第三，與在他之前的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一樣，哈伯馬斯運用了被稱為內在批判的方法。與外部的批判相對而言，這種方法也可以被稱做內部的批判。批判理論家認為，這是由黑格爾和馬克思首創的方法。從某些角度而言，它與蘇格拉底的論辯方法更為接近。蘇格拉底式的論辯採取對話的形式，這是為了便於辯論，論辯者實際並不認可某個觀點，論辯的目的是為了揭露觀點的不連貫與不真實。不管這個方法源自何處，批判理論家是想從這一方法本身出發，而不是以超越於該方法之上的價值或標準為基礎來批評某個對象——某個社會觀點或某部哲學著作，使其不真實性大白於天下。

《結構轉型》是對「公共領域」範疇的一次內在的批判。「公共領域」一詞翻譯自德語Öffentlichkeit，包括了公共性、透明性和開放性等意思。在哈伯馬斯看來，歷史上啟蒙運動的理想——自由、團結、平等——是公共領域這一概念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些理想為內在的批判提供了標準。比如，18、19世紀的資產階級社會會因為沒有實踐自己的理想而受到批判；

同樣，西德社會也會因為與那些理想所預示的包容、平等、透明的社會不符而受到批判。因而，《結構轉型》堅持了批判理論的原初範式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理想：認識社會領域並且通過闡明社會變革的潛能指引社會變革。

然而，哈伯馬斯對於社會、政治與文化形態的歷史分析與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截然不同。直到兩人身後將近二十年，哈伯馬斯才對他們發表公開批評，認為兩人對於合理化的闡述過於片面、消極，他們的啟蒙辯證法概念又缺乏經驗的、歷史的正當性和內在的一致性。哈伯馬斯自己的著作則試圖拯救批判理論的初衷：他將啟蒙運動的一種表述得更細緻、更具有正當性的歷史，與一種更有內在一致性的社會理論模式聯繫了起來。

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概念

《結構轉型》記錄了理性的公共領域從沙龍、俱樂部、咖啡館等18世紀歐洲的文藝性公共團體中誕生的過程，又描述了這個公共領域的逐步衰落和瓦解。哈伯馬斯的敘事細致入微，徵引內容極為廣泛。

18世紀初，公民權的確立保證了個人享有結社和言論的自由，出版自由的確立又促進了咖啡館、沙龍這樣的有形空間和可供市民自由參與公共討論的文學雜誌的形成。在這樣的論壇中，人們可以自願集會，

作為平等的人參與公共論辯。這些論壇享有兩種意義上的自主權：首先人們是自願參與論壇的討論，相對不受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影響。公共領域的成員通過交換和契約完成經濟上的交易，不光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公共領域存在於自願的結社之中，作為個人的公民統一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利用他們自己的理性展開不受束縛的、平等主體之間的討論。很快，共享的文化氛圍得以形成，與其他因素一起，使公共討論的參與者得以發現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並加以表達，並使他們形成共同善的概念。哈伯馬斯認為，公共輿論的標準概念是圍繞着共同善的概念形成的，共同善的概念正是在這些脆弱但又受到庇護的公共商談論壇中確立的。

隨着公眾的權威和影響的擴散，公眾輿論開始逐漸發揮作用，對缺乏民意基礎和開放性的政府的權力施以監督約束。通過檢驗法律政策是否符合共同善，公眾可以有效地審查它們的合法性。雖然公共領域開始發揮政治和社會功能，但是，它不能被視做任何具體的政治機構或與這類機構聯繫起來。公共領域是一個非正式社會領域，它介於資產階級市民社會與國家或政府之間。

作為理念和意識形態的公共領域

正如哈伯馬斯在《結構轉型》中所闡發的，他的

批判理論是內在批判的一種變化形式，又被稱為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或意識形態批判。為了理解這一稱呼的內涵，有必要探究一下意識形態這一概念。阿多諾把意識形態定義為「必要的社會幻覺」或「必要的錯誤社會意識」，年輕的哈伯馬斯持有與此類似的理解。據此來看，各種意識形態都是關於其自身的錯誤觀念和信仰，社會總以某種系統的方式促使人們認同這些錯誤觀念和信仰。但是，意識形態又不是普通的錯誤信仰，比如將杯子裏的咖啡誤認為是茶。意識形態是被廣泛視為正確的錯誤信仰，因為事實上所有社會成員都在某種程度上被誘導着去相信。此外，意識形態是功能性錯誤信仰，部分地由於被廣泛接受，意識形態可以支撐某些社會機制、支持其維護的支配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具有社會必要性。

這樣來看，意識形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發揮其社會功能。它能使實際上屬於社會的、人為的，因而原則上具有可變性的機制顯得恆定而自然，或者它能使實際上服務於一小部分階層利益的機制看起來是為每一個人謀福利的。比如，假如每一個人都相信經濟規律是獨立於人類而自然存在的，那麼工人就更容易接受低工資作為他們的勞動回報，而不是把這種交易看成是需要改革的結構性不公。因而，意識形態批判作為一種內在的批判，能揭露此類必要的社會幻覺，並被寄予厚望來使遭到批判的對象——在這裏是製造幻

覺的社會結構——更具流動性和可變動性。

哈伯馬斯認為，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既是一個理念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公共領域是供平等的主體參與理性討論以求得真理和共同善的空間。作為理念，開放、包容、平等和自由都無可指摘。然而事實上，這些理念不過是意識形態或者說幻覺罷了。因為現實中，能夠在18世紀歐洲的咖啡館、沙龍和文學雜誌等公共領域參與討論的人，總是限於少數擁有財產、受過教育的男性。財產和教育是兩項未予明說的資格要求。實際上，大多數的窮人和未受教育者，以及幾乎所有的女性，都被排斥在外。所以，公共領域的理念依然只是烏托邦，一個關於值得追求的平等、多元社會的夢想，從未徹底實現過。在第二層意義上，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概念也仍然屬於意識形態。因為，文化公眾和理性公眾共享的文化所催生的共同善和公共利益的觀念，將實際上是少數受過教育、擁有財產的男性的利益呈現為全人類的共同利益。

哈伯馬斯研究方法的關鍵之處在於，它表明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儘管存在局限性，但絕不僅僅是一個幻覺，因為它原則上是開放的：只要擁有獨立的財產並受過教育，不論聲望、地位、階級或者性別，都有權參與公共辯論。沒有人在原則上被拒斥在公共領域之外，雖然在實踐中對於很多人來說不盡如此。毫無疑問，個人自願參與、任何人都能加入、人們在其中

作為平等的成員展開不受拘束的辯論以探求真理、追尋共同善，這樣的組織是一個烏托邦，但是，這是一個在過去和現在都值得追求的烏托邦。在18世紀一段短暫的歷史裏，這個烏托邦不僅在知識界獲得認同，而且開始在社會、政治實踐中暫時地、部分地得到了實現。

公共領域的衰落

《結構轉型》的第二部分描述了公共領域的瓦解和衰落：隨着報紙和雜誌逐漸獲得巨大發行人量，它們被服務於少數強勢個人之私利的資本主義大公司所吞並。在失去批判功能的同時，公眾輿論也逐漸失去了其雙重的自主性。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公共領域於是不再是孕育理性觀念和可靠信仰的溫床，而是蛻變成操縱、支配民意的舞台。作為大眾傳媒的報紙、雜誌和暢銷小說同廣播電視一起，變成了消費品：它們不是促進而是開始遏制人類的自由和發展。毋庸置疑，國家、經濟和政治機構越來越諳熟於取得公眾的擁護與支持，從而給自己披上一層合法性外衣。然而，這種支持的基礎在於卑躬屈膝、不作批評、經濟不獨立的消費者的個人意見，而與形成於理性的公共辯論中的健康的公眾輿論無關。

對於文化工業如何製造着越來越多千人一面、馴順盲從的消費者，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有過描述；上述